



钱锺书文学批评 话语研究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en Chung-shu's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焦亚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钱锺书文学批评 话语研究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en Chung-shu's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焦亚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研究/焦亚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3666-9

I. ①钱… II. ①焦… III. ①钱锺书(1910~1998)—文学评论—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916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一娟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29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回首还不那么遥远的百年前后,我几乎想不出不是评论家的诗人,也想不出不是诗人的评论家,他们寻常的阅读,即是学问的积累;他们寻常的写作,亦即是相互的商量和培养——钱锺书所谓的“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即是。

——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

——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的外部表征	(31)
--------------------	------

第一节 “通多方而不守一隅”:批评的语言风格	(31)
------------------------	------

一 “化堆垛为云烟”:在旁征博引的背后	(31)
---------------------	------

二 “道一贯而用万殊”:现象及意义	(38)
-------------------	------

三 “遍则不偏,透则无障”:破执	(43)
------------------	------

第二节 “文言白话,骅骝比美”:批评的语体特征	(48)
-------------------------	------

一 “异量之美”:勿以繁简判优劣	(48)
------------------	------

二 “过去的现在性”:辩证的文化史观	(54)
--------------------	------

三 “一时快意大言”:“我手”果能“写吾口”?	(57)
-------------------------	------

四 “不如径用文言”:化境	(62)
---------------	------

第三节 “岂有常体”与“常有其体”:批评的文体特色	(68)
---------------------------	------

一 “皆有月旦藻鉴之用”:开放的文体观	(68)
---------------------	------

二 “实无妨以诗解诗”:诗词曲文小说的互释	(70)
-----------------------	------

三 “余雅喜谈艺”:《谈艺录》辨体	(76)
-------------------	------

四 “控名责实,札记为宜”:《管锥编》辨体	(81)
-----------------------	------

五 “半中不西、半洋不古”:《七缀集》辨体	(87)
-----------------------	------

第二章 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的内在特质	(91)
--------------------	------

第一节 “资吾操觚自运”:批评的逻辑起点	(91)
----------------------	------

一 “作与识原是一家眷属”:创与评的双向互动	(91)
------------------------	------

二 “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才与识	(96)
--------------------	------

三 “识古来雅人深致”:作为诗人的批评家	(99)
----------------------	------

第二节 “窥古人文心所在”:批评的基本策略	(102)
-----------------------	-------

一 “交互往复”:隐性语境的构建	(102)
------------------	-------

二	“连类举似”:文本细读	(107)
三	“互映相发”:意义阐释	(111)
第三节	“诗者艺也”:批评的主要向度	(118)
一	“人生大本,言语其一”:语言批评意识	(118)
二	“诗学亦须取资修辞学”:微观研究	(122)
三	“言之与物,融合不分”:形式本体观	(128)
四	“呼应起迄,自为一周”:文本自足观	(131)
五	“破常示异”:陌生化	(134)
六	“文蕴两意”:复义	(138)
七	“比喻之法,尚有曲折”:隐喻	(140)
第三章	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的生成原因	(144)
第一节	“芝兰继芳,骚雅接响”:国学根底	(145)
一	“家学自有渊源”:无锡垞山钱氏	(145)
二	“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学识与门径	(147)
三	“文化型家族”:传统之熏染	(150)
第二节	“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西学素养	(153)
一	“一个新天地”:异域文学的想像	(153)
二	“会通中西”:从桃坞到清华	(155)
三	“饱蠹”:遍读西方经典	(160)
第三节	“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个性气质	(162)
一	“拓万世之心胸”:狂傲	(162)
二	“自我愉悦之道”:机趣	(166)
三	“兴致没处寄放”:痴气	(169)
第四节	“细与论诗一樽酒”:交游唱和	(173)
一	“近读何书,有何心得”:父执	(173)
二	“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清华师友	(175)
三	“何生重得听谈艺”:诗坛同好	(180)
第四章	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的现实意义	(188)
第一节	“诗必取足于己”:回到文学本身	(188)
一	“有德者必有言”:批评的诗教传统	(188)
二	“因世以求文”:“强别因果”的社会学批评	(191)
三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与史	(196)

四	“将文学与文明混同”:泛化的文化研究	(200)
第二节	“若诗自是文字之妙”:重构批评的语言维度	(206)
一	“惟意所欲”:批评的诗性传统	(206)
二	“赤手空拳”:“印象派”还是“摸象派”?	(211)
三	“考据本为文学研究之方法”:实证批评	(214)
四	“得意莫忘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220)
第三节	“文评诗品,本无定体”:寻找有意味的形式	(225)
一	“文备众体”:批评文体的多样化	(225)
二	“双单行道”:以西学为标杆的文体革命	(228)
三	“破体”:自创新境	(235)
四	“重见天日”:唤醒沉睡的传统	(243)
结语 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的双重审视		(248)
参考文献		(266)
后 记		(283)

引言

一 孤独的言说者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钱锺书走过的道路颇耐人寻味，也极具启发。一方面，他自觉地呼应历史的诉求，毫无保留地踏上了打通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道路；另一方面，他又刻意地回避了自身所经历的各个时期那些蔚然而成风习的学术潮流，试图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学术品格。可以说，钱锺书的学术经历以及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学术个性，都使他成为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个传奇，一个异数。

（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强调语言形式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向有“以道统文”、“以文载道”的传统，近现代文学批评自肇端之日就与政治启蒙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壮大更使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得到毋庸置疑的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的功利主义取向始终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主流，而对于置身这一潮流的大多数批评家来说，藐视并企图超越这一核心价值是艰难甚至危险的。就此而言，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并没有给纯粹的语言形式研究留下多少生存空间，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人进入到这个没有标志的禁区，尝试着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研究天地，如果要在他们当中找到一位最坚定的守望者，则非钱锺书莫属。

钱锺书为人为文，喜好放言高论，热衷臧否人物，却几乎从不涉及与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的话题。在文学批评领域，他专注于中西文学、诗学的比较，尤致力于中国古典诗歌诗艺的探讨。在文学创作领域，他的小说和散文表现的是普泛意义的人性、思想与情感，常常以冷眼旁观的态度传达对世态人生的嘲讽，而那些收录于《槐聚诗存》中的旧体诗作，则更像一位躲进书斋的旧式文人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浅吟低唱。在政治上，钱锺书一贯冷漠，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构筑的“围城”，他既无冲进去的欲望，也

无冲出来的想法，自始至终抱定不反抗也不顺从的漠然态度，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远离世事纷扰的“多余人”。谢泳在《〈观察〉撰稿人的命运》一文中曾分析说：《观察》的撰稿人有三种，一是想通过自己办报办刊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如储安平；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如费孝通；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独钟情于学术，如钱锺书。《观察》本是政论性很强的刊物，而钱锺书在上面发表的却是几篇简短的学术随笔，其对政治生活持有的回避态度可见一斑。谢泳据此认为，钱锺书乃是一位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很难在任何历史的波动中找出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许多知识分子如果单看他们一生中的某一段，那是令人敬重的，但如果考察他的一生，就会发现他也许不值得尊敬。作者最后说：储安平、费孝通、钱锺书，同年出生，同是江苏人，均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和完整的大学教育，都曾留学英美，但这三个人最终的结局，或许从他们在《观察》上发表文章时就已经预示了。^① 首倡钱学的郑朝宗曾评价钱锺书：“这人最能耐寂寞，安本分，决不作出位之思，所以几十年来，不管外间如何风云变幻，他总是坚守着自己的冷摊子。他从不强出头，所以也不曾落得青冥垂翅，丢尽毛羽。”^② 还有研究者认为钱锺书“不是柳青、赵树理，更不是丁玲、周立波，怎样‘洗澡’也洗不掉他头脑里蒂固根深的独立之意识和自由之精神。他也不是老舍、巴金，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今是而昨非，从而天真地积极参加唱诗班。他的历史感悟与人生智慧不允许他这样做”。^③ 他人的这些评价也许多少会有些隔膜，为更好地认识钱锺书的学术品性，不妨读一读他自己在如火如荼的50年代写下的诗句：

惯看浮云知世事，懒从今雨数交游。（1950，《答叔子》之二）
身心着处且安便，局趣容窥井上天。（1952，《生日》）

① 参见谢泳《〈观察〉撰稿人的命运》，见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392页。钱锺书在《观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计有：《致储安平书》（1946年9月第1卷第4期）、《说“回家”》（1947年3月第2卷第1期）、《补评英文新字典》（1947年9月第3卷第5期）、《游历者的眼睛》（1947年12月第3卷第16期）、《杂言——关于著作的》（1948年3月第4卷第2期）等。

② 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载《读书》1983年第1期。

③ 沈治钧：《关于钱锺书的〈百合心〉》，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阅老舍的《写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和杨绛的《第一次观礼——旧事拾零》，两相对照，同是写国庆观礼，前者激昂的情绪与高亢的声调，恰与后者淡漠的语气以及略带调侃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杨绛自然不是钱锺书，但不妨用她来做某种参照，因为她和钱锺书的“声气相投”是出了名的。

是非忽已分今昨，进止安容卜险夷。(1953,《叔子重九寄诗见怀余久未答又承来讯即和其韵》)

容膝易安随处可，不须三径羨归来。(1954,《容安室休沐杂咏之一》)^①

诗中的“惯看”、“懒从”、“安便”、“容窥”、“安容”、“容膝”、“易安”、“归来”，等等，都是与那个躁动不安的“革命年代”极不协调的语词，而传达出的正是钱锺书真实的心态。对于他这样一位真正的读书人来说，能够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求心灵的平静与独立，未尝不是明智甚至狡黠的求全之道。^② 钱锺书对待世事与政治的漠然态度，使他在自己最成熟的人生阶段，成了一位生不逢时的人物，他的那些充满智慧与洞见、幽默与机趣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一度沦为无人欣赏甚至无人提及的东西，几乎湮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口号之中。假如钱锺书生活在谈玄尚远、任情率性的魏晋时代，能够与二三知己衡文论艺，月旦人物，放言高论，想必他的学术个性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张扬。不过，也许恰恰是这种下定决心不融入主流意识的立场，成全了钱锺书为后世所敬仰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不妨想一想吴晗和冯友兰，一个是与钱锺书同样齐名的清华才子，一个是与钱锺书亦师亦友的著名学者，三个人后来的人生遭际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巨流的冲击裹挟之下抱定的想法和持有的态度，实已决定了每个人的悲喜人生将以怎样的方式上演。^③

① 钱锺书：《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8、109、111、113、118页。

② 钱锺书诗曰：“诗书惯作祟，文字忧招祸”。钱锺书：《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9页。在荒诞年代，钱锺书有自己的处世哲学：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倘无说话的自由，至少还有沉默的自由。）参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6页。

③ 钱锺书曾说：“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这五位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钱锺书：《谈交友》，见《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0页。他提及的“五位老师”中就有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钱锺书曾在文章中反复提及冯友兰的学术著作并流露钦佩之情。参见钱锺书《作者五人》、《论复古》，见《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5、332页。不过，对于后来冯友兰哲学研究的转向，钱锺书并不认同，他评价说：“冯先生是我的恩师。但是我们对学问的看法不同。”或许因此，坊间才有钱锺书访美期间指责冯友兰缺乏文人骨气之类的传言，以至引发杨绛与宗璞之间的笔墨官司。可参阅宗璞《不得不说的话》，载《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杨绛《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载《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5期。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欲望非常强烈，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体现的并非人生价值的多元选择，而是面对残酷人生时诚惶诚恐的自我安慰。身处变化多端的时代漩涡之中，读书人能超然于主流价值之外，真正保持自己独立学术品格者，少之又少，而“以诗书安身立命，不做官，不羨功名，不求飞腾，是锺书一贯坚持的人生观”^①。应该说，在随波逐流的年代，钱锺书最大程度地保持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独立品格和学术自由。李锐有一次在谈及陈寅恪以“学术当不受任何限制”为由婉拒郭沫若邀其就任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一事时，就特别强调“这是钱锺书告诉我的”，“钱锺书算比较独立了，但是他也只能告诉我，他没办法”^②。而论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郭沫若与陈寅恪算得上两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他们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表现生动地折射出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人格。郭沫若“积极”的自我改造，陈寅恪“顽固”的学术立场，都成为后来人们感慨不已的话题。相比之下，钱锺书为人为学或许没有这么高调，作为一位“北京城最后的隐士”（Beijing's last hermit），^③他耐住寂寞，在自己喜爱的学术小天地里不动声色地耕耘了很多年。彼时的中国学术界，政治话语甚嚣尘上，作为一种“作场或工房中批评”（workshop criticism）^④的语言形式研究，早已成为“狭隘”甚至“错误”的代名词。而世易时移，今天还有谁会记起那些当年红极一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呢？反倒是被视为“形式主义者”的钱锺书在自己“衷心嗜好”的“狭小圈子”里“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完成的学术著作，毫无疑问地具有了

① 卞孝萱：《怎样解读钱锺书〈沉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钱锺书一生文章，只1946年的《十五天后能有和平吗》一文直接涉及时政，倘若细究，此不足200字的短文在实际内容上也与题目带给人的想像相去甚远。参见钱锺书《十五天后能有和平吗》，见《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6页。吴学昭说：“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参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6页。

② www.douban.com/group/topic/22309406。

③ Jasper Becker, “Death Closes Book on Literary Genius”, *Sunday Morning Post*, January 10, 1999.

④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5页。

恒久的价值和意义。^① 它们以及它们体现出的那份近乎固执的学术勇气，既导致了钱锺书的备受冷落，又成全了他的备受推崇。造化就是如此地弄人。

（二）超越旧学新知畛域，促进传统现代融会。在钱锺书刚刚踏上学术道路时，传统中国面临的处境诚如李鸿章所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② 尽管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固守天朝旧制者太有人在，但颀颀与固执在势不可挡的时代浪潮面前，很快就显得格外不合时宜，请看蒋梦麟在《西潮》中的描述与感慨：

半世纪以前，这些轮船曾经把自来火、时辰钟、洋油灯、玩具以及其他实用和巧妙的外国货带到中国。我童年时在安宁的乡村里就曾经玩过这些洋货。我们天真而不自觉地吸收这些新鲜的玩艺儿，实际上正是一次大转变的开端，这次转变使中国步上现代化之途，同时也经历了相伴而生的苦难、扰攘、危险以及旧中国恬静生活的迅速消逝。^③

来自遥远异域的古怪器物 and 思想，在平静的中国引发了强烈的躁动、惶惑与热切，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西方，掀起了译介和学习西学的热潮。对于这场历史大变局而言，学术思想和学术范式的革命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令人痛苦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积淀，早已浸淫其中的传统学人面对如此剧烈的学术转型，所承受的心灵煎熬是可想而知的。即如李欧梵所言：“中西各种思潮在脑海中交战，以至产生所谓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到底我是谁？到底我的兴趣是什么？为什么在思想上如此西化？是否应该‘回头是岸’？”^④ 晚清以降的中

① 在香港版《宋诗选注》的前言中，钱锺书曾自陈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自己一方面“企图识时务，守规矩”，一方面“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没有得到“爽朗”的显露。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77—479页。在笔者看来，这个仍没有“爽朗”说出来的“衷心嗜好”，其实就是对诗歌语言、修辞、手法、技巧的浓厚兴趣。倒是当年的一些“批判”文章说得直接明白，胡念贻先生就称：“钱先生把宋诗几乎都看成形式主义，是因为他自己戴上了形式主义的眼镜来看宋诗”；周汝昌先生说钱锺书“虽然也谈政治内容”，但“远不如谈艺术来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参见胡念贻《评〈宋诗选注〉序》，周汝昌《读〈宋诗选注〉序》，分别载1958年12月14日、28日《光明日报》。

② 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九。

③ 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228页。

④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总序”第3页。

国知识界，保守主义的盲目排外、激进主义的全盘西化、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你方唱罢我登场，尽管表现的方式复杂多样，实际上都未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夷夏有别”观念，往往很自然地将固有的传统与异邦的文化对立起来给予审视，真正能够超越新旧中西畛域的人实不多见。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的观点自不必说，即使是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其根本立场也是如此。梁启超倡导中西文明“结婚论”，^①表面上看似超越新旧中西之争，其实仍是一种特殊意味的文化本位主义，因为既曰“结婚”，就需分出男女主次，或许其乐融融，抑或同床异梦，“体”、“用”之别与“夷”、“夏”之分，实无二致。有研究者就认为，由于传统成为积淀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意识结构和知识结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西学的择取种类和接受程度。在译介西方学术著作时，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进行过滤或改写，以传统为接受的先在视界，将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进行简单的比附。^②可以说，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异质文化更多持有的还是一种审慎的心态，常常以与对象保持足够距离的方式，小心翼翼地进行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尝试。

相比而言，在这一问题上，作为“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③钱锺书的许多看法则非常通透。首先，他对在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上的偏颇观点持批评意见，例如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他曾忆及与陈石遗老人的谈话，陈当时慨叹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吗？”钱锺书不敢与之理论，只好找借口敷衍。^④事实上，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旧式学者，陈衍这种对西方文化不以为然的态度在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其次，针对中西

① 梁启超说：“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3页。

② 参见邵滢《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4页。

③ 李铁映：《深切缅怀学术文化大师钱锺书》，载《江南论坛》2000年第2期。

④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1—102页。钱锺书称“好多老辈文人有这种看法”，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樊增祥诗句：“经史外添无限学，欧罗所读是何诗？”二是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外国小说一箱看完，无所取处，尚不及黄淳耀看《残唐》也！”钱锺书批评说：“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科学上不如西洋，就把文学作为民族优越感的根据”；“看来其他东方古国的人也抱过类似态度。龚古尔就记载波斯人说：欧洲人会制钟表，会造各种机器，能干得很，然而还是波斯人高明，试问欧洲也有文人、诗人么？”参见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3页。

文化交流中某些简单粗疏的做法，钱锺书也多有讽刺。在小说《灵感》中他曾借一位人物之口批评“那些讲中国文明而向外国销行的名著”，称：“那些比较东西文明的学者们归纳出来的规律”，无非是“咱们招手，手指向下，他们招手，硬把手指朝上；咱们敬礼时屈膝，他们行敬礼反而举手；他们男人在结婚前向女人下跪求爱，咱们男人在结婚后怕老婆罚跪”等等，简言之就是“咱们的国家、人民、风俗、心理不是据说都和西洋相反么？”^① 熟悉钱锺书文风的读者很容易在字里行阅读出他惯有的讥讽意味，而被讥讽的对象正是他一贯反感的“比较东西文明的学者”“归纳出来的规律”。^② 钱锺书还认为，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许多看似卓有成效的东西文化比较其实并不值得称道，他说：“这种近似东西文化特征的问题，给学者们弄得烂污了。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③ 第三是批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利主义趋向，在《管锥编》中他说：

夫所恶于“西法”、“西人政教”者，意在攘夷也；既以其为本出于我，则用夏变夷，原是吾家旧物，不当复恶之矣，而或犹憎弃之自若焉。盖引进“西学”而恐邦人之多怪不纳也，援外以入于中，一若礼失求野、豚放归笠者。卫护国故而恐邦人之见异或迁也，亦援外以入于中，一若反求诸己而不必乞邻者。彼迎此拒，心异而貌同耳。^④

钱锺书揭示了以西学比附传统的两种权宜之计：一是欲传播西学又恐国人心生拒斥，遂以西学比附传统，上演“礼失求野”这种瞒天过海的喜剧；一是欲固守传统又怕国人见异思迁，遂同样以西学比附传统，上演“反求诸己”这种自欺欺人的闹剧。在钱锺书看来，讲新学也罢，讲旧学也罢，做法虽然不同，实质并无分别，均未摆脱“夷夏有别”这一根深蒂

① 钱锺书：《灵感》，见《人·兽·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9页。

② 杨绛说：钱锺书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附录”第348页。

③ 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见《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6页。

④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0页。

固的观念与思维方式。^①

在如何看待新旧中西文化这一问题上，钱锺书始终持包容的态度与立场，终其一生追求破除旧学新知畛域、促进传统现代融会的学术理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钱锺书乃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彻底地破除新旧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人物。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时，他说：“所谓国粹或洋货，往往并非中国或西洋文化的特别标识”，“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② 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时，他说：“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③。他还很刻薄地说：“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他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里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④ 不难看出，在审视和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时，钱锺书完全摒弃了那种简单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的褊狭观念，其特有的通脱立场与开放胸襟在这些表述中彰显无遗。

钱锺书一生治学，尊崇传统而又批评传统，熟悉西学而又反思西学，我们似乎不必在意他的这种矛盾性，因为在他眼中，新学旧知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彼此之间的藩篱更不存在。一部《谈艺录》，序言即开宗明义，点出撰写的原则：“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而所以能如此，正是由于在作者看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者还举例说：“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⑤ 这部畅论中

① 这种看法在当时很流行，如称：“究之泰西之学，实出于中国，百家之言藉其存，斑斑可考。”（清）苏舆辑：《翼教丛编》卷五《湘学公约》，光绪己亥夏四月汇源堂重刊本。钱锺书在1986年的一篇序中仍不忘对此论调做一番嘲讽，他说：“海通以还，吾国学人涉猎西方论史传著作，有新相知之乐，固也，而复往往笑与扑会，如获故物、如遇故人焉。”钱锺书：《汪荣祖〈史传通说〉序》，见《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页。

② 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见《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7页。

③ 钱锺书：《谈中国诗》，见《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6—167页。

④ 同上书，第167页。

⑤ 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序”第1页。

西文学、诗学的著述流露出的意思，与《管锥编》所谓“有不同之文字，而无不同之性情，亦无不同之义理”，^①实旨归一致。一生治学，在娴熟运化西学的同时又时刻不忘向传统的回归，对新知识永远孜孜以求，对旧传统总是念兹在兹，这正是中西文化交汇时代钱锺书的真实写照。

需要强调的是，钱锺书融会中西的学术道路，是在深厚国学根底与西学素养基础上的必然选择，是在洞悉中西文化阡奥和摒弃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后的理性选择，自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者借“复古”之名僵守传统的做法，也与文化折衷主义者有“体用”之名而无中西文化交流之实的做法大异其趣。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钱锺书充当的是“骑驿”的角色，采用的是“打通”的方法，达成的是抉发“诗心文心”的目的。^②研究钱锺书的德国学者莫芝宜佳认为，如果从严格的意义讲，钱锺书并不是“比较文学家”，而是一位中西文化之间的“架桥者”，“一个乔装的牧师，用各种不同的婚礼套话为每一对有情人主婚”。^③事实也是如此，对钱锺书而言，现实中的传统与现代，旧学与新知，不可能像概念那样能够以一种界线清晰、非此即彼的状态存在着，这是他主张在不同文化之间自如游走的首要前提，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不仅显示了一位中国学者直面西方文化时的开放胸襟，同时也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自己对本土传统的热爱与信心。

（三）破除学术范式束缚，兼具新旧中西体式。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文论具有强烈的诗性特征，而西方现代批评则偏重科学实证，二者各具优势和缺憾。西学东渐以来，传统文论言说方式的缺点被不断放大，现代中国文论在获得逻辑性、技术性、精确性等科学特征的同时，其弥足珍贵的直觉性、具象性、整体性等诗性特征也渐渐消失。伴随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旧的格局已经倒塌，新的文体正悄然萌动。在西学的冲击下，原有批评体式虽还时常出现，但却开始增加了许多新质”。^④中国传统文论的这一现代转换至少包含了以下内涵：一是语言风格从典雅、优美转向严谨、规范；二是体例结构从零散、片断转向完整、系统；三是表述方式从感性、随意转向理性、逻辑。此外，小至西式标点的使用、版式的变化、行文的格式、注释的规范等，也都成为这场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场学术范式的变革中，钱锺书再次显示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

①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7页。

② 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序”第1页。钱著中颇多“骑驿”之说，如“只许两家鸡犬相闻，而不许骑驿往来”，“混畦畦而通骑驿”，等。参见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66页。

③ [德]莫芝宜佳：《〈管锥编〉与杜甫新解》，马树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④ 冯光廉等：《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455页。